

清末民初的闽东畲族乡村教育

●刘 冬

摘 要 清末民初是闽东畲族乡村教育发展的历史节点。在这一时期,畲族传统的歌教得以拓展,私塾教育相对普及,国民教育、教会教育等现代教育对畲族乡村有着不同程度的渗透。以上这种教育格局的出现,是由清末民初的社会背景与闽东畲族乡村自身的实际决定的。这一时期的闽东畲族乡村教育,在福建民族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关键词 清末民初 闽东 畲族教育

作 者 刘冬,福建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福州 350003)

在研究福建的畲族历史文化时,人们主要将视角置于闽东,探讨福建的畲族教育自然也不例外。闽东作为文化地理学概念,一般泛指清代福宁府五县(霞浦、宁德、福安、寿宁、福鼎)与福州府的古田、屏南、连江、罗源四县。从明清开始,闽东一直是福建畲族的主要聚居地,至今畲族人口占全省畲族人口的一半以上,^①且分布广泛,保留的传统文化内容丰富、特色明显。

明代,畲族人口大量迁徙于闽东。清初,朝廷“编图隶籍”、“编甲完粮”户籍制度在畲族山区逐步施行,畲民的游耕围猎经济随之终结,畲族“大分散、小聚居”的聚落分布格局逐步形成。从乾隆年间清廷绘制畲民画像入“职贡图”,可知清政府承认了畲民区别于汉人的“苗夷”身份。从清廷在省修志书上披露嘉庆年间福鼎钟良弼事件和李殿图的言论,表明其对于山区畲民读书取仕的认可。^②清王朝一系列较为开明的苗夷政策,为闽东畲族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畲族比以往更加稳定的生存状态与社会生活,不仅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有利于畲汉民族文化的互动与交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此时,新制与旧统共存,建设与破坏同期,人们的社会生活面临着剧烈的震荡和嬗变。这一历史潮流波及福建城镇与农村,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闽东畲族乡村,给闽东畲族乡村教育的变化与发展带来历史契机。本文着重论述这种变化与发展的内容、动因、效果,以及在畲族教育史中的作用。

一、传统歌教的拓展

“歌教”是畲族乡村耕读文化的主要构件,指畲族通过世代歌谣传承的特殊手段来普及乡村教育。畲族将歌谣称为“歌言”,意为以歌为言。畲族认为,歌唱与言谈一样重要,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他们以歌叙事,以歌传情,以歌表意,以歌交流,其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种行为都可以用歌言来表达。畲族谚语说“俗不离歌”。畲族异常发达的民间口传文艺,担负着民族传统教育的功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与相当多的畲族村落,歌教是乡村教育的基本途径,有的时候有的村落歌教甚至是唯一的途径。

歌言唱本是畲族乡村“歌教”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教材,唱本文字以汉字为主,兼有符合畲民生活习惯的别出心裁的造字和特殊的符号。畲民家族视唱本为神圣的家珍,一律公开传阅、传抄、传唱。畲族“歌教”场所从家庭开始,教育的原初对象是幼儿,母亲是第一位启蒙教师。构思奇特、想象丰富的儿歌,让畲民从孩提时代便接受歌言的洗礼。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同伴习歌、路遇拦歌、节日练歌、客寮盘歌、歌场会歌等等,畲民既识字习文,又练就歌唱本领,在无数的歌场竞赛中还自然而然地诞生了一代代歌王。一般而言,家族中能精读歌言唱本并创作歌言内容的终究不是多数,大多数人是靠博学强记和歌场历练得以掌握歌言知识与歌唱技巧。

传统畲族歌言的题材十分丰富,大致分为巫歌(宗教歌)、讲古歌(史诗)、习俗歌、有缘歌(情歌)、种田歌(农事歌)等,主要涉及畲族自身的历史、宗教、礼俗、文

艺、农事等等。到了清末民初，畬族歌教内容有了相当程度的拓展与质的飞跃，其重要的标志是白露坑畬族村“小说歌”的出现。白露坑位于霞浦县东南部，那里是闽东畬族传统的“歌窝”。白露坑出现了畬族歌言创作群体，他们特别擅长将汉族章回小说、评话唱本改编成畬族长连正歌，这种新的歌言形式被命名为“小说歌”。

“小说歌”不是机械地搬用汉族故事，而是进行艺术再创造，即在“小说歌”中融入了畬族独有的价值判断、审美情趣、民族情结与叙事风格。白露坑的“小说歌”创作群体中之出类拔萃者是一代歌王钟学吉。当年，“小说歌”的广泛传播借助了位于霞浦县城内的“福宁三明会馆”。会馆初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鼎盛于民国初年，由闽东、浙南诸县的畬族人士集资兴建。清代，霞浦是福宁府驻地，是闽东政治、经济的中心，会馆专门用于接待过往于闽浙两地的畬族商家与学人。“三明会馆”除了具有接待功能外，还兼有帮助畬民打官司，维护畬族权益，诸姓毕集，举行祭祖仪式，以及传唱小说歌，传播畬族文化等诸多功能。

《霞浦县畬族志》记载了畬族小说歌的篇目，共120篇，涉及的作者有十余人。其篇目包括《齐天大圣》、《梁祝》、《孟姜女》、《桃园三结义》、《七品芝麻官》、《刘海钓蟾》、《铁弓缘》等。还有根据畬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创作的小说歌，如《钟良弼》、《蓝佃玉》等。小说歌作为畬族歌教的教材，其形式、题材上的创新，拓展了歌教的领域。由于小说歌脱胎于汉族民间文艺，因此，其歌教的内容更多地汲取了汉民族文化，并有了质的飞跃。

二、私塾教育的推广

明清时期，逐渐定居的闽东畬族，其社会权利与经济实力出现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清初，要想在生产力低下、经济十分落后的畬族乡村延师设教，是完全不可能的。家族教育的标志性机构私塾与书院，在畬族乡村几近阙如。随着畬族乡村生活日趋稳定，乡村畬族的经济实力相对增强，自身生存的条件也逐步改善。加之，闽东历来有着畬汉两族和谐相处、经济交往频繁的传统。闽东畬汉经济的交往，进一步促进了畬汉文化的互动。乡村畬民逐渐改变原有的一些观念、行为、社会准则，而选择性地接受了当地的汉文化，并从原本孤立闭塞的独立文化整体调整为畬汉交融的混合文化体系。这时，畬汉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融入了汉人家族文化因子的畬民家族文化得以建构。建祠、修谱、祭祖等汉族家族行动，逐渐支配着闽东畬族的文化生活。一些较有经济实力的畬族乡村将鼎建宗祠、延请汉族文人住祠修谱，作为一种文化时尚。据本人田野调查，闽东畬族乡村宗谱的修撰、祠堂的兴建，大致

始于清代中期，即嘉庆、道光年间。而祠堂与大量宗谱的出现，则在清末民初。

畬民家族文化的兴盛，使得家族教育的标志——私塾，在闽东畬族乡村开始出现。畬村私塾一般由富裕户发起，延请先生，其他户送子附读。私塾先生多为汉族，也有极个别由畬民担任。私塾在闽东畬族乡村大量出现，并逐步形成了与汉族乡村相似的耕读并举文化。

据《罗源县畬族志》载“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罗源）福湖、塔里两村设私塾3所，在塾生童8~10人。……此后，畬族乡村私塾逐渐发展。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设私塾的乡村除福湖、塔里外，还有八井、许洋、肖洋、竹里、大坪、庭洋坂，塾馆增到11所，生童20人。清光绪至宣统年间（1875~1911年），设私塾19所，在塾生童32人。”^③

另据《霞浦县畬族志》载，塾馆多设在众厅、祠堂、宫庙，或塾师自己家中，课桌椅多由就读自备，教育内容主要有识汉字、学汉文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等，有的还教授珠算。同时，一律用霞浦话（当地汉族方言）教读。志书特别记述了安东乡白虎坑（今福建省霞浦县溪南镇白露坑村）人钟学吉，7岁上私塾，学业精良，写得一手好字。光绪元年（1875年），钟学吉也开始设私塾课童。^④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随着社会的转型，私塾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目的与时代的要求渐行渐远，内外交困的清政府被迫废止科举制度，传统的旧式的私塾教育逐渐被新式的正规教育所逐步取代。然而，新式的正规教育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得以推行。在广大落后的畬族乡村，由于缺乏新式的正规教育赖以继的较发达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在很长的时间内，私塾仍然是畬族乡村教育中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机构，仍然是畬民获取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民国时期，闽东乡村虽然陆续兴办国民学校，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触角尚无法延伸到所有的畬族乡村，不少畬村的私塾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其与国民学校并存，照旧发挥着应有的启蒙心智的功能。

三、现代教育初露端倪

闽东畬族乡村的国民教育始于民国初期。当时，畬族子弟主要到邻近汉族村落的国民学校就读，畬村内少有国民学校设立。民国初年，畬族乡村最早的国民学校设于闽东古田县富达畬族村。1920年，以富达村村民、前清秀才蓝宝田为首自筹经费兴建校舍，建立蓝田小学。^⑤除了蓝田小学这一个特例，绝大多数畬族乡村还维持着传统的私塾教学。

民国元年（1912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制订《整理私

塾办法》，认为“私塾在小学发达以后，自当归于消灭；然在小学未遍设之前，从事整理，亦未始非小学之一助”。1914年12月公布的《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明确要求对私塾“采奖进主义，期渐同化于学校”。

福建省地方政府对私塾的态度是将不合格的加以取缔，改良后的私塾则通过某种形式提升为短期义务小学或普通初级小学。各地私塾减少，新式小学增多，各乡私塾凡有学校处近已停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畲族乡村陆续兴办起国民学校，较之闽东汉族乡村，之间大约相差了10年时间。1936年至1948年，福安、霞浦、福鼎先后有20多个畲族聚居乡村办过中心民校或国民学校。

但是，民国时期的畲村办学缺乏连续性，时办时停，时断时续，加之畲民生活拮据，无力供子女上学，就总体而言，闽东畲族受现代教育的机会还是较少。所以，建国之初的畲族社会调查资料表明，福建畲族仍然是“识字者绝少”。^⑥

民国时期，闽东个别畲族村落还接触到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现代西方文明。福建是近代中国最早被迫开埠的省份之一，西方基督教教士最早涉足之地，是包括闽东在内的福建广大区域。外国教会为了能在福建立足，为了扩大影响并吸引更多信徒，他们采用办医院、设学校等方式取得当地民众的信任。教会学校一度遍及全省所有的县及重要乡镇，甚至深入到许多官办教育未涉及的偏远农村地区，使得一些居住在山区的贫苦畲族农家子弟也能获得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据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在中国：都柏林大学福建传教团史（1885—1935）》一书记载，“1921年，一个完全由一支原住民民族组成的全新的教会，在一个叫作‘草岗’的当时还不为传教士和官方教士所知的山村成立了。”草岗（今霞浦水门畲族乡茶岗畲族村）是霞浦县的一个典型的畲族村，1930年有3名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在那里兴办了“圣义小学”，学校附设在教堂里，免费招收了30名畲族子弟。学校聘请了一位教员，“一位据说在八十年代（1880年代）教过福宁府第一班男孩后又迁到他处的教员被这个家族联系上了。他被邀请给这个家族的孩子授普通课程，但同时，他也教给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主祷文、信经、告解等等。”^⑦4年后，教堂遇火灾，学校告停，具有宗教色彩的西方文明的传播戛然而止。

传教士们认为，基督教要进入中国家庭，必须先引导妇女皈依上帝，因而在各级各类教会教育中，消除了当地男、女童受教育的不平衡与差异。在教会学校中，畲族女子从中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古田县大桥镇梅坪村贫苦畲族农家出身的雷静贞，于1916年进入古田县城教会所办的毓菁小学读书，后又升入毓菁女子中学与该校师范班学

习。1928年，雷静贞受美国教会委派，前往山东烟台启喆师范学习聋哑教学。学成归里，在古田县城的毓菁小学附设一个聋哑班，招收聋哑儿童入学。由此，毓菁小学遂成为福建第一家聋哑教育场所。

西方传教士虽然以设立学校为手段，借此扩大教会的影响，但教会学校在客观上对于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起了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教会教育也为贫困的畲族子弟接受教育提供了方便，使得畲族学子在私塾、国民教育之外，又多了一项选择。

清末民初是闽东畲族教育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闽东畲族乡村的教育出现了多维度的教学格局。即原有的“歌教”突破了自身的局限，得到了应有的拓展，融入了更多的汉族历史文化的内容；家族文化体系中的私塾教育涵盖面增大，许多闽东畲族乡村实现了耕读并举，这种文化现象在民国社会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与此同时，具有现代意义的国民教育、教会教育亦驻足于闽东畲族乡村，虽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是，已使闽东畲族乡村透露出文明的气息。清末民初的闽东畲族教育有着自身的特色，也取得一定的成就，在福建民族教育史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清末民初，闽东畲族教育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数十年时间，是由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形势与畲族乡村精神生活的实际所决定的。应该指出的是，就闽东乡村教育的总体而言，畲族教育还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注释：

①据2000年“五普”资料统计，宁德地区畲族人口159040人，另福州所辖连江县11918人、罗源县18405人，合计189363人，占福建省畲族人口375193人的50.47%。

②蓝图、蓝炯熹《闽浙赣交界地：地理枢纽与畲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以历史地理为视角》，《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③罗源县民族与宗教事务局《罗源县畲族志》，2011年印行219页。

④霞浦县民族事务委员会《霞浦县畲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405页。

⑤《富达畲村志》2001年铅印本36页。

⑥福建省编辑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340页。

⑦R. M. 格文《“都柏林三一学院”在中国：都柏林大学福建传教团史（1885—1935）》，爱尔兰教堂印刷出版公司，1985年，83页~84页。